

终 · 结 · 者 · 译 · 丛

主 编
周 宪 许 钧

[美]丹尼尔·贝尔 著
张国清 译

意识形态的终结

——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The End of
Ideology

江苏人民出版社

终 · 结 · 者 · 译 · 丛

主 编
周 宪 许 钧

[美]丹尼尔·贝尔 著
张国清 译

意识形态的终结

——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The End of Ideology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美)
贝尔著;张国清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书名原文:The End of Ideology
ISBN 7-214-02967-7
I. 意... II. ①贝...②张... III. 冷战-研究
IV. D8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8281 号

书 名 意识形态的终结
著 者 [美]丹尼尔·贝尔
译 者 张国清
责任编辑 蒋卫国 张惠玲 刘沁秋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0.125 插页 2
字 数 469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967-7/G·975
定 价 32.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终结者译丛序

周宪 许钧

凡事总有始终。过程被淡忘乃是常有的事，但始与终倒总是印象深刻。道理很简单，在时间的生存体验中，段落和节奏必显出过程始终。所谓起始者，指事之不必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发生者；所谓终结者，乃事之上承某事而下无他事其后者。亚里士多德如是说。

太阳升起落下，海水涨潮落潮，生命诞生死亡，王朝更替兴衰……旧的终结意味着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又必脱胎于旧的终结。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此乃生活世界之真谛。因为没有起始与终结，世界便凝固不动了，生命便归于永恒的沉寂。

新千年的到来，别有一番意蕴。虽说这不过是时间长河中一个平平常常的点，但在纪年的意义上，却带有某种深层的历史感。惟此开启了新，所以也就终结了旧。

然而，终结感并非千年逝去的关口方才出现。60年代以后，“转向”一词在西方学界颇为流行。罗蒂“语言的转向”一语既出，种种“转向”纷至沓来，诸如“解释的转向”、“文化的转向”、“批判的转向”、“视觉的转向”等等。究其“转向”义，大有宣判终结之嫌。与“转向”一词同时出现的是各种“后……”的标识，所谓“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后福特主义”、“后信息时代”、“后启蒙时代”等等，莫衷一是。何谓“后”？不就是标志着“上承某事而下无他事其后者”吗？从“转向”到

“后……”，必然引出“终结”，诸种“终结”的理论一时热闹起来，什么“历史的终结”、“主体的终结”、“艺术的终结”……仔细琢磨，西方知识界热衷于命名各种“转向”、“后……”和“终结”，看来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反观种种“终结”图景，社会发展变迁的脉络赫然眼前。所以说，谈论“终结”，不啻于奠基新起点。

基于此一理念，本丛书聚焦于西方学界晚近热门的种种“终结说”，从哲学、社会、艺术、教育、性别观念、生产方式等诸多层面，揭橥当代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种种激变。虽然这些著述的基本主题同是“终结”，但各方写家观点纷然杂陈，不仅所涉论题千差万别，而且所持观念立场亦大相径庭。激进观念有之，保守学说有之，兼而有之者亦不乏其人。进一步，在不同见解和陈述中，我们又不难瞥见其中某些“终结”之历史的和逻辑的关联。诚然，方家诸说未必总是在理，也未必合乎中国国情，但不过兼听则明。虚心聆听各路人士的高头讲章，或许有助于开启我们的深入思考。

英伦小说家福斯特有小说名曰《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此书名颇有趣：“房间”本无“风景”，只有位置和朝向；然则，位置和朝向差异，所见景观异趣迥然。“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当视野宏阔，奇观异景尽收眼底。说实话，我们选编这套丛书的初衷，便是为有兴趣的读者打造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吁请各位看官步入其内，以各自好奇而探索的目光，去打量那种种不同的“终结”景观。

至于说，所选篇什到底藏着什么“风景”，这答案只能留待睿智的读者去追寻了。

谨序。

2001年9月于古城南京

译者序

丹尼尔·贝尔和西方意识形态的终结^①

—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19—)是一位中国读者并不陌生的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和重要思想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贝尔一直是一位具有广泛读者的著作家。我们一般称他为批判的社会学家,不过,在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H·特纳所著的《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②一书中,我们却见不到关于丹尼尔·贝尔的专门介绍,学术界反而更频繁地把他看作是一位未来学家^③、哲学家^④、政

① 在“冷战思维的轨迹:《意识形态的终结》及其以后”(载于《国际政治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4—104页)和“观念的终结:后现代的意识形态状况”(张国清:《后现代情境》,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63—193页)中,我对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及相关问题作了探讨。本文是在前两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② 乔纳森·H·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③ 由于丹尼尔·贝尔写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他同《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一起,被看作是一位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具有深刻预见力的学者。参阅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④ 参阅涂纪亮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治学家、社群主义者^①、新保守主义者等等。^② 贝尔的学术活动同时涉足了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等专门领域。由于其学术活动领域的广泛性,贝尔是一位不太好把握的思想家。

贝尔的主要学术著作有:《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2年)、《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1961年,1988年,2000年)、《极端右翼》(1964年)、《今日资本主义》(1971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蜿蜒之路》(1980年)、《社群主义及其批判》(1990年)等等。其中《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中译本已经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出版。贝尔是一位综合性思想家,这种综合性使他在众多领域具有了发言权,且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点从《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也得到了证实。

作为冷战的产物,《意识形态的终结》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冷战在观念上作出的直接反应。其核心主张是,发端于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衰落,新的地区性意识形态正在兴起。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

① 由于贝尔写了《社群主义及其批判》一书,他便同麦克·桑德尔、阿拉斯太·麦金太尔、迈克尔·华尔采和查尔斯·泰勒一起,成了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参阅俞可平:《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3-24,59-60页,1990年。

② 赵一凡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开头对丹尼尔·贝尔一生的学术活动和成就作了很好的概括:丹尼尔·贝尔“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与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据有领先地位。50年代以来,贝尔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1952—1969年)和哈佛大学(1969年至今)担任社会学教授,参与创办了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声誉渐高的刊物《公众利益》。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首。近年来,他作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益高,颇具影响。”参阅《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绪言”,第1页。

“左”、“右”论战已经丧失了意义。^① 他较早提出且较全面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正在日益趋同的见解。他认为两大社会正在面临着相似或相同的基本社会问题,因此,两者不仅有对抗的一面,而且还可能有相互借鉴的方面。因此,丹尼尔·贝尔探讨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结束“冷战”状态的可能性。他实际上是较早提出“全球化”观念的西方学者。在两大阵营在军事、经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对垒的情况下,在当时实际上不存在“第三条道路”的情况下,贝尔的思想显得尤为可贵。

《意识形态的终结》还对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变化、职业结构变化、社会流动、企业工作效率、劳工运动、政党、政治意识、种族等等问题作了新颖的社会学剖析。这是对 20 世纪后半世纪的政治和思想论战产生重要影响的一部著作,是对当今世界格局具有重大预见力的一部著作。当然,由于作者立场所致,对于书中某些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20 世纪 80 年代,布热津斯基发表了《实力与原则——

① 例如,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临近结尾处明确地提出:“摆在我们美国和世界面前的问题是坚决地抵制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的古老观念,现在,纵使‘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还有理由存在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参阅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406. 1988) 过了 30 多年之后,邓小平同志在 1992 年的南巡讲话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不过两者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语境和动机。东西方之间在社会发展方向方面,尤其在意识形态方面,从以对抗为主导向以对话为主导的转变经历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谁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当然,这场斗争决不是没有意义的。回顾这个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到,当“现代性”带有太强烈的西方色彩的时候,也就是说,当“现代性”作为西方专利强加于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时候,由于抗拒“西方化”进而抗拒“现代性”的运动便不可避免。因此,东方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便具有一种要走出一条东方道路道路的潜意识动机和动力。

1977—1981 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①等著作，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1999，不战而胜》^②，1989 年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论文“历史的终结？”并在不久出版了一部同名著作。^③进入 90 年代后，又一位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④等等。这些著作在当时都曾经引发了广泛争论。透过其争论的表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冷战思维的轨迹。“意识形态终结”论、“不战而胜”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在今天重提这些话题，重现这些话题的历史语境，将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冷战时期发生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激烈争论，更加清楚地看到发生在当时西方学术界内部的激烈争论，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冷战思维仍然延续的方式。并且，对这段特定历史的重新了解和评价，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我国学术界在近几年关于后现代话题的讨论。^⑤

① 参阅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 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译林出版社，1989 年。

② 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

③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 年。

④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1998 年。

⑤ 我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由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同西方知识界的左倾思想和右倾思想的争论具有密切的联系。并且，那股思潮同 20 世纪 60 年代在西方国家引发的学生运动和各種政治运动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围绕‘意识形态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而开展的争论既构成了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理论来源，又构成了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国清：《后现代情境》，第 164 页。

在这里,通过对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所作的自我辩护作一番还原和重读工作,我们试着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像贝尔及后来的布热津斯基、福山和亨廷顿这样的西方学者千方百计地替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进行辩护。他们既做了许多歪曲历史和事实的报道,也道出了某些实情。从表面上看来,其各自的观点似乎存在着矛盾,但都充分地暴露出了他们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他们宣告意识形态已经衰微,历史已经终结,乌托邦已经破灭;另一方面,他们又拼命地为自己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把历史的终结点引向了资本主义,引向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且,其所谓的“终结”还隐藏着这样一层含义: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走向所有其他人类社会和民族都迟早要走向的惟一目标和终点。

二

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有一个有点哗众取宠的论题:20世纪“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贝尔承认,这本著作是因其书名而非内容才出名的^①。这本书一出版就遭到了来自左翼批评家们的批判,他们认为激进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涨反驳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主题。其他批评家则把它看作是替“技术治国论”或美国资本主义“现状”所作的一次“意识形态”辩护。对于这些批评和指责,贝尔进行了自我辩护和反驳。那么,《意识形态的终结》究竟算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呢?

首先,作为一部“警世录”,《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当时发生

① Bell, Daniel, *The End of Ide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409. 1988.

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关于苏联和斯大林主义前景所展开的一场观念论战的一部分。那场论战的一方是萨特、梅洛-庞蒂、布莱希特、恩斯特·布洛赫和卢卡奇，他们是共产主义苏联的同情者；另一方是加缪、雷蒙·阿隆、亚瑟·柯斯特勒、伊尼佐埃·西罗尼、乔治·奥威尔和C·米洛兹等人，他们是共产主义苏联的批判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莫斯科审判对几乎是整个老布尔什维克领导班子的可怕处理，由于斯大林大肃反的被披露，再加上纳粹和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所有这一切都打消了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迷恋。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所作出的顽强抵抗和巨大牺牲，对于由苏维埃政权所带来的新气象的种种希望，使人们重新萌发了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向往。于是，梅洛-庞蒂写了一本小册子《人道主义和恐怖》，论证了压迫是螺旋式进步的辩证逻辑。布洛赫发表了《希望原理》，提出了一种揭示人类启示之乌托邦原理的历史哲学。萨特则声称，历史将选择苏联或者美国作为通向未来的继承人；并且，苏联比美国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因为前者是工人阶级的化身，而后者是粗俗的资产阶级的化身。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围绕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未来，进而围绕整个人类的未来而展开的争论便在整个西方知识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展开，有人提出了“意识形态是否将要终结”的问题。敏感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探讨人类的未来问题，随着东西方越来越多的著名知识分子介入这场论战，一场规模浩大的论战便在世界范围里开展了起来，而文化和思想领域成了一个主战场。

在这场论战中，第一个使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的是加缪。他在1946年就提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在

加缪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骗人的把戏。这个论题在西方右翼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重大发展。由克罗兹曼主编的《失败的上帝》(1949年)一书收集了西方右翼学者对苏联社会中存在的虚假性的各种证明。在《被囚的心灵》(1953年)一书中,米洛兹证明了苏联知识分子教条化马列主义所导致的一些消极后果。由于苏联的意识形态高度同一于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系,它导致了人们对权力的极度迷恋。于是,一些西方学者明确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斯大林和当时的苏联,他们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因此,随着冷战时代的到来,一些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开始向当时的苏联全面发难。而恰恰在这时,赫鲁晓夫1956年对斯大林重大错误的披露,随之而来的波兰十月事件,1956—1957年的匈牙利革命,进一步印证了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预想,使得他们的反共反苏势力更加嚣张。

第三,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的最后一章中提出了意识形态时代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那个问题随后变成了一个主要由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组成的国际文化自由协会发起的1955年在米兰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的主题。在递交那次大会的论文中,阿隆、波拉尼、希尔斯、克罗斯兰、列普锡特和贝尔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即19世纪的传统意识形态已经过时,已经被新的历史事实和社会条件所否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虽然侧重点和论题各有所重,但是这个核心思想在他们的各种研讨会和著作中得到了精心的探讨。

第四,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1950年起,贝尔开始了围绕“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而开展的写作。10年后,即1960年,它终于以《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书名由自由出版社出版。1961年再版时贝尔对它作了修订。1988年,该书交由哈佛

大学出版社出版,贝尔写了一个长篇的“跋”,对近三十年人们围绕这部著作而展开的争论作了辩护和回应。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读到三种版本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不过其基本精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三

按照贝尔自己的说法,《意识形态的终结》不是一部前后连贯的研究专著,而是由一些共同的线索连结起来的一个论文集。这些线索是:对从事观念论战的知识分子角色作一番社会学考察;考察在其历史背景中的意识形态观念,对它与宗教的早期角色,即宗教在变更情感和信仰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比较;对美国社会作一些社会学研究,以期证明 19 世纪的社会发展理论已经无力处理 20 世纪的美国社会正面临着的极其鲜明的复杂问题。^①

因此,《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部属于实证社会学性质的著作,不过,贝尔还是在书的最后部分作出了一些预测。在考查了青年左翼知识分子一再表现出来的对意识形态的渴望之后,贝尔指出,新的启示、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认同将来自第三世界。他写道:

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正当 19 世纪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争论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形成着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这些意识形态就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

^① Bell, Daniel, *The End of Ideology*, P.412.

的明显差异中蕴含着 20 世纪后 50 年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19 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①

在 1961 年增补的结语的最后几页中,贝尔以一种忧虑的语气写下了这样几段话:

本书以意识形态的终结作结。从思想上讲,这是一部讨论一个时代的著作,一部由于社会的变化而使其论断易于被推翻的著作。但是,结束本书并不意味着对它置之不理。现在,鉴于对过去不甚了了的“新左派”正在出现,这一点就显得更加重要……

在对待古巴和非洲新兴国家的态度上,思想成熟的意义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将受到检验。因为在“新左派”中间,有人时刻准备着以一颗纯洁的心灵,去把“革命”作为暴行的托辞来接受——简言之,以可怖的激情,去抹掉最近 40 年的教训。^②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贝尔对于 20 世纪后半世纪世界格局的基本发展有一个正确的估价。他看到了一种新

① Bell, Daniel: *The End of Ide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403.

② *Ibid.*, P. 405.

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在亚洲、非洲各地兴起,预见到了地区性意识形态的兴起。他预见到这些新的意识形态将同本地区、本民族的经济发 展密切地结合起来。或者说,发展经济和增强本民族或本国的实力将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主题。“经济建设”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题,而“革命”、“阶级斗争”等等意识形态将成为过去。^① 这是由普遍性意识形态终结之后所带来的话题。然而,在当时情况之下,那种普遍性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有日益激化的趋势。这种激化构成了冷战的另一个方面,即思想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精神斗争的方面。

四

从《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产生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反映的并不是贝尔个人的见解,而是一个时代的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于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根本看法。《意识形态的终结》既是那场冷战在观念上的反映,又自觉地充当了参与那场冷战的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理论武器,甚至成了他们的一个招牌和一个口号。但是,作为一部个人著作,贝尔也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见解,并且千方百计地从现实中去寻求可靠的依据。因而它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第一,《意识形态的终结》明确地反对 19 世纪的普遍性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构成要

① 在我国,真正认识到整个国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变的时间大约是在 1978 年之后,即《意识形态的终结》发表 30 年左右之后。而这个过程的真正完成是在 1992 年即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

素互动模型。贝尔承认,《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冷战的产物,是一部“政治性”读物。不过,由于其所探讨的政治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它为摆脱大陆社会学范畴结构作了一些努力。贝尔对社会的思考是以假定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分离为根据来进行的。贝尔认为,19世纪的普遍性社会发展理论把这两者要么看作是合而为一的,具有调节行为的价值体系,要么看作是一个整体。在其中,物质世界的基础结构“决定着”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秩序。贝尔认为,这些观点混淆了不同社会历史水平上的不同变化节奏。就经济或技术方面的变化而言,由于它们是工具性的,是以“线性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存在着一个清晰的新陈代谢原理:假如新事物具有更高的效率或更强的生产能力,那么,从成本上考虑,它将被人们所采用,但是在文化领域,不存在这样的新陈代谢原理:文化的各门各派要么受到了传统的维护,要么因不同学术观点的融合而无规则地发生嬗变。但是审美的革新并不“淘汰”以前的形式,它们只是开拓了人类的文化种类。从历史上看,这些领域有时会宽松地兼容在一起,但是在更多时候处于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中。

第二,《意识形态的终结》强调美国社会的独特性,尤其是美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独特性。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前面两个部分探讨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他认为,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作为一个经济仲裁者,出现了国家的角色;家族资本主义瓦解了,资产阶级从统治集团中分离出去;从害怕个人债务的封建社会向推崇享乐的消费社会转化;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显赫的上层社会集团的形成;职业样式的基本变化,产业工人阶级的萎靡不振,工会的停滞不前,以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假如人们精确地给予认定的话,那么这些结构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才得以明朗起来。因

此,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普遍性社会发展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都不适用于美国社会。贝尔认为,美国社会的独特性否证了19世纪社会发展理论的普遍性。

第三,《意识形态的终结》表明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20世纪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表现出了极度的厌恶和恐惧。他们几乎出于本能地反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意识形态的终结》探讨了各种信念,探讨了某种信念体系,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世俗宗教的具体表现。不过,其中显然强烈地带上了个人的主观色彩,因为,这种分析、这种语气和这种情感把贝尔这一代人的经历同他们对人性和历史的判断连结在了一起。同很多人一样,贝尔在年轻时曾经加入青年社会主义运动。他担惊受怕地度过了30年代和40年代。贝尔认为,当时曾经有过纳粹的死亡集中营,一种超乎所有文明人想像的野蛮;还有过苏联的集中营,它们使所有的乌托邦景象都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因此贝尔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悲观主义、罪恶、悲剧和绝望中找到了其智慧的一代人。”

贝尔由此产生了对集体运动的恐惧、对政治的恐惧以及对煽动仇恨的政治学的恐惧,并且这种恐惧形成了贯穿于他一生的观点。这种恐惧首先在其专著《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2年)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那部著作探讨了伦理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一种“在不道德社会中的道德人”的状况。贝尔使用的一个支配性隐喻是“生存于这个世界但不归属于这个世界”^①的政治运

① 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多次引用了这一短语。他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是“既不生存于这个世界又不归属于这个世界”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是“虽然生存于这个世界但是不归属于这个世界的运动”,而放弃了政治权力目标的劳工运动是“既生存于这个世界,又归属于这个世界”的运动。